

双墩文化刻画符号的考古学背景初探^{*}

张东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北京市 100101)

关键词: 双墩文化; 刻画符号; 陶器生命史; 考古学背景

摘要: 双墩文化刻画符号是研究中国早期文字起源的重要实物资料, 以往以文字学研究方法占据主导, 而考古学背景, 尤其是关于其载体的陶器生命史研究相对薄弱。本文从陶器选料、陶器晾坯与陶器废弃等环节与符号的相关性几方面, 对双墩遗址出土刻画符号进行了观察, 强调了考古学背景研究对认识史前刻画符号的重要意义。

Keywords: the Shuangdun Culture; inscribed symbols; the life cycle of pottery; archaeological context

Abstract: The inscribed symbols of the Shuangdun Culture are important material evidence for the research into the origins of early Chinese writing. Previous research has been dominated by graphemics, while studies of the archaeological context, especially the life cycle of the pottery bearing the symbols, have been relatively limited.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inscribed symbols discovered at the Shuangdun Site by observing their correlation with the selection of raw materials, the air-drying of pottery, the discarding of pottery and other aspects, and emphasizes the importance of the research into archaeological context to the understanding of prehistoric inscribed symbols.

DOI:10.16143/j.cnki.1001-9928.2025.05.008

双墩文化是淮河流域新石器时代中期偏晚阶段最具地域特色的史前考古学文化, 主要分布于淮河中游的豫东、皖北、苏北及长江沿岸的宁镇地区, 绝对年代集中在 5300~4800 BC。双墩文化多个遗址都发现有结构相同的陶器刻画符号, 而且不同遗址符号间存在明显共性。刻画符号总量已达 700 多件。其中, 蚌埠双墩 630 余件^[1], 定远侯家寨 80 余件^[2], 句容丁沙地 14 件^[3]。虽然并非所有双墩文化遗址均出土刻画符号, 但刻画符号显然已成为双墩文化最受关注的文化因素。蚌埠双墩遗址发现的刻画符号数量最多, 种类最丰富, 被认为是研究中国早期文字起源重要的实物资料, 也是探索淮河流域史前人类认知领域的重要媒介。1989 年双墩遗址考古试掘发现的陶器符号资料首次公

布, 拉开了双墩文化刻画符号研究的序幕。2008 年双墩遗址发掘报告出版, 系统公开了相关考古发现^[4]。随后, 2009 年“蚌埠双墩遗址刻画符号暨早期文明起源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召开, 促使双墩文化刻画符号研究进入新阶段。2014~2019 年, 双墩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重新启动, 以多学科综合研究手段辅助揭示了双墩史前社会面貌, 为双墩刻画符号的考古学研究奠定基础^[5]。本文在回顾双墩文化刻画符号研究现状的基础上, 分析其与考古学背景的相互关系, 从而探索双墩史前刻画符号新的研究思路。

一、双墩文化刻画符号研究现状

为了更好地把握双墩文化刻画符号研究动态, 我们将既往研究按照以下三个方面分

* 本文得到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双墩文化出土刻画符号的考古学研究”(项目批准号: 22BKG004) 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学科建设“登峰战略”项目(项目编号: DF2023ZD14) 资助。

别叙述。

1. 符号分类

首次公布双墩刻画符号的徐大立将这些符号归纳为四类：动物类、植物类、单体类和组合类，但他也指出这种分法还不尽科学，因为符号中有写实、抽象、会意和变形等多种现象，其内在关系还难以把握^[6]。双墩遗址考古发掘报告对刻画符号进行的分类较为细致，大体划分为象形和几何两大类，具体有动物形、植物形、三角形、方框形、弧线形、半框形、圆圈形、数字形、钩形、叉形和房屋形等，另外根据符号结构的不同，采用了单体、重体（≥2个相同符号）和组合符号（≥2个不同符号）的分类方法，残缺或主观不易辨识者则归为残形或特殊形^[7]。

考古发掘报告这套分类方法便于客观描述刻画符号的结构特征，但对于个别符号有“据形测义”之嫌，容易将表达意义相近的符号归入差别较远的类别中。例如黄德宽就指出报告分类中的“重线鱼形”应属于几何类水波纹，而几何类中圆圈形、半框形、方框形和十字形实际上是“天”“地”和“方位”的抽象表达^[8]。鉴于象形和几何两大类之间的内在联系，吕春瑾认为“象思维”是双墩刻画符号的内在机制，主张将两大类改称拟象类和抽象类^[9]。葛英会从古文字学的角度，以传统六书构字理论中的象形和会意为基础，将双墩刻画符号主要归为象物和象事两类（余为其他和意义不明者）^[10]。

2. 符号释读

刻画符号的分类实际上是建立在释读研究的基础上，对于符号释义的不同会形成归类的差异。徐大立释读的双墩刻画符号的内容最为丰富，包括网具、（蚕）丝束、植物和建筑类等^[11]。黄德宽提出有些几何类刻画符号的构形方式和古汉字一致，并分别进行了释读^[12]。黄亚平发现双墩文化符号组合有层

次规律，揭示了几种固定的构形方式，并认为这从文字构形原理上影响了成熟文字^[13]。蔡运章将双墩刻画符号理解为卦象文字范畴，在此基础上释读了19个卦象文字^[14]。冯时认为双墩春秋墓表达的宇宙观可追溯至双墩刻画符号中^[15]。李新伟也提出双墩刻画符号中有许多与太极观念有关^[16]。

仅就刻画符号表现的内容来看，写实性较强的符号最易释读，其含义也最易达成共识。抽象程度愈高，简化程度愈大的几何类符号释读越易产生歧义。正如何驽提出的，古人以符号为媒介对现实事物进行符号编码，将自己的思维传递、留存、传播给今天的受众。符号释读的目的就是揭示古人对现实事物的编码方式，以理解符号制作者的思维^[17]。虽然大部分释读者并未提出符号释读的方法论，但我们可以总结出，基于共情假设的直觉法、古文字学的字形（构形）回溯法与民族志的行为对应法是最常见的释读方法。

3. 符号功能

学术界对于双墩刻画符号功能的探讨，长期聚焦于是不是文字的争论，虽然期间也有学者推测其具有宗教祭祀或商品贸易的功能。双墩刻画符号具有一定表意、计数和记事功能，是处于前文字阶段的地域性符号体系。双墩刻画符号虽与汉字没有直接关系，但在构形方式和思维特点方面具有一定关联性^[18]。王蕴智认为可以将双墩符号视为新石器时代中期淮河中游地区双墩文化繁荣阶段的一种地域性原始文字，与黄河上游的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符号，黄河下游的大汶口文化符号，长江中游的大溪文化符号，以及太湖流域的良渚文化符号渊源各不相同，是不同社会文化背景下富有独特内涵的文化产物，共同为解释汉字起源提供依据^[19]。

陶器刻画符号是古代文明中普遍存在的

文化现象，欧亚大陆早期文明都曾有过使用陶器符号的历史。何靖曾预设文字产生具有普遍适用性的动力机制^[20]，但这并没有得到广泛材料的证实。例如，贝瑟拉发现原始楔形文字中许多数字符号与一些陶筹（Token，用以计数的小型陶器）在形状和功能上吻合，陶筹和原始楔形文字在社会生活中都和商品交换密切相关^[21]。也有学者提出，史前陶符的出现虽然远早于文字，但还没有证据表明哪种文字是由陶符单线演进产生的^[22]。文字标准的争论掩盖了双墩刻画符号具体社会功能的研究，因此有学者主张把汉字起源研究的重点放回到对相关实物的考古环境及其反映的社会机制和政治背景的研究上^[23]。

综上所述，长期以来双墩刻画符号的研究主要采用了文字学研究的方法论，在符号分类的基础上，利用共情直觉法、字形回溯法和民族志对比法对符号进行释读，进而聚焦于符号功能和文字起源等问题。严文明先生曾指出，如果把同一符号体系的所有资料加以排比分类，从符号本身的结构及其相互联系来加以分析，再结合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和文化特点，对其可能的含义做些逻辑性推测，也许不失为一种比较可行的方法^[24]。目前已有对同一符号体系内资料进行整理研究的实践^[25]。从考古学方法理论看，史前刻画符号研究还有很大的空间可以拓展。虽然刻画符号的研究主要涉及古人精神领域，但刻画符号载体的物质性特征却非常鲜明，而这正是考古学研究所擅长的领域。双墩刻画符号研究不仅要在同一符号体系内开展内容的分类和释读，更应关注刻画符号载体的考古学背景。

二、双墩文化刻画符号考古学背景分析

双墩文化刻画符号主要以陶器为载体。陶器刻画符号的物质性提醒我们必须首先考

虑其背景（或情境，即context）^[26]。背景（context）是对遗物的堆积环境（matrix）、来源（provenience）以及共存关系（association）的记录，它涉及考古材料的时空背景以及人们对考古材料出土位置的评价，其具体形态受到了遗物原初拥有者的制作与使用方式、遗物的废弃方式以及废弃后的历史过程的影响^[27]。陶器有其生命史过程^[28]，双墩刻画符号以陶器为载体，其产生、使用和废弃必然与陶器生命史关系密切。我们主张在双墩文化陶器刻画符号研究中加强考古学背景的研究方法（contextual approach），将符号放在陶器生命史过程中考察。

1. 陶器选料与符号相关性

双墩遗址陶器均选用当地的黄褐黏土为塑形陶泥。由于淋溶作用强，黏土中含有大量铁锰结核，特征鲜明。双墩文化中很少见到淘洗纯净的细泥陶，绝大部分陶器都添加羼合料。三种基本的羼合料为蚌末、炭屑和云母。这三种陶质的陶器实用功能上也表现出鲜明的特征。

夹蚌陶在双墩文化中最为常见，数量最多，双墩遗址目前发现的淡水蚌类残骸达十几种，食余的蚌壳是遗址内制作片状切割工具的原料和陶器羼合料的重要来源。其特性是易于成型，被刮抹后器表光洁，导热性能良好，但其中的碳酸钙在酸性饱水的环境下易溶解流失，形成空隙密集的“泡陶”^[29]现象。大部分夹蚌陶被用作炊器，体型大，质量重，不便于移动。

夹炭陶数量仅次于夹蚌陶，主要用于盛储器和盛食器。夹炭陶的特性在于塑形性好，轻便易持。陶胎中可以观察到炭屑、炭粒和炭泥等多种形式。通过显微镜可以观察到夹炭陶中有水稻颖壳的植硅体残留，稻壳经过不同程度的粉碎或炭化处理与陶泥均匀糅合^[30]。炭末在烧制过程中易形成孔隙，所

以夹炭陶器表通常都施红衣或黑衣，或进一步施以彩绘，烧制成彩陶，并做磨光处理。统计表明，几乎所有的刻画符号都施于夹炭陶器上，尤其是外表红衣、内里渗碳的陶碗占绝大多数。另外少量红衣陶豆的圈足内侧也见有符号。

夹云母陶在双墩文化中占比很小。作为羼合料的云母不易获得，地层中偶尔可见云母残块。这类陶器的陶胎中还伴有石英、长石等多种矿物，肉眼观察时容易归为一般的夹砂陶。夹云母的陶器主要为釜罐类。

夹蚌和夹云母陶器多用于炊器，以素面为主，这两类陶器虽在装饰上有区别，但都反映了在日常使用过程中的固定性。夹炭陶不仅施红衣或黑衣，有些还装饰褐彩，是刻画符号有选择性的载体。夹炭陶质轻，使用频率高，具有明显的便携性特点。多个双墩文化遗址都发现有结构相似的刻画符号，正是夹炭陶自身便携性的体现。

2. 陶器晾坯与符号相关性

刻画符号对器形选择非常明确，主要为夹炭陶碗，极个别为陶豆。碗、豆均为盛食器。我们观察到的刻画符号主要形成于陶坯入窑之前，陶器晾坯具有不同于其他器物的特点。

仔细观察陶器刻画符号的笔画特征发现，符号刻与陶器不同干湿状态具有明显的关系。我们按时间次序将陶器制坯烧制划分了4个过程：坯体成形、坯体半湿、坯体干后

和烧后。其中前三个过程均为入窑之前，最后一个过程很可能已进入陶器使用阶段。虽然在上述陶器干湿变化的不同阶段均出现有刻画符号，但在坯体半湿和坯体干后过程中的刻画符号数量最多。坯体成形和坯体烧后过程刻画符号数量极少，且见于陶器下腹部，呈对称分布，与绝大多数陶碗底部符号有所不同。（图一）

由于陶器坯体成形修整完毕后要经过充分的晾坯后才能入窑烧制，所以晾坯是制陶工艺流程中耗时最漫长的程序。晾坯通常采用“阴干”的方式，所需时间一般至少要3天，其目的主要是令坯体中的水分缓慢蒸发，避免坯体开裂。这在考古学材料^[31]和民族志材料^[32]中都有大量案例。晾坯过程中为了提高干燥效率，坯料不仅要正置阴干，还要人为反扣阴干。目前所见双墩刻画符号绝



图一 双墩文化陶器不同干湿状态所见刻画符号

大多数出现在陶碗底部，也正对应于这一反扣行为。因此，刻画符号的制作者很有可能就是从事陶器生产的陶工。

3. 陶器废弃与符号相关性

双墩遗址核心区位于东北—西南向延伸的台地上，东部被取土破坏形成断崖，现存面积不足2万平方米。东南和西南部存在两处大型自然洼地，1991~1992年发掘区位于东南部洼地边缘，坡状文化堆积较陡。2014~2015年发掘区位于西南部洼地坡面，坡状文化堆积平缓。两次发掘均发现了大量陶片和兽骨堆积，出土陶片均为双墩文化日用陶器残片，磨圆度差，破碎严重，拼对率较低。陶器口缘和底缘有明显使用痕迹。兽骨的破碎度也很高，经观察应为食用残骸，大部分兽骨经过火烧或人为砸击。堆积中还发现了鹿角靴形器、骨锥、骨针、陶拍、陶纺轮、陶网坠、石斧和石锛等工具。种种迹象表明陶片和兽骨堆积应为废弃后不久人为混杂倾倒、铺垫形成的，倾倒方向主要来自台地核心区^[33]。

从考古发掘的情况可以大致复原双墩遗址核心区的形成过程：早期人类在台地顶部的居住活动留下了柱洞、储藏坑和灶址等遗迹，该区域应该是早期人类的定居聚落。晚期台地经过人为平整，主要是将台地边缘的凹沟洼地铺垫平整，甚至将早期的储藏坑夯填。由此推断，双墩遗址刻画符号的载体出现在人类生活废弃堆积中，未发现其他特殊处理的现象表明作为刻画符号载体的陶器也是日用陶器，应与日常生活紧密相关。

三、余 论

我们利用考古学背景的研究方法，聚焦于双墩文化刻画符号的载体，从陶器生命史角度进行初步分析发现：物质性（质地）不同的陶器中，轻质陶器是刻画符号的重要载

体；刻画符号主要产生于陶器制作最漫长的晾坯阶段，符号的创作者最有可能是早期定居聚落中的制陶者；这些符号的载体绝大多数为日用陶器，从其废弃的背景还看不出与其他陶器存在显著差异。

刻画符号考古学背景研究不同于文字学所关注的字形研究，而是回归刻画符号的载体，厘清符号载体的物质生命史，有助于探索古人对于符号的认知。双墩刻画符号的考古学背景探索也为史前陶器刻画符号的研究提供了考古学本位的思路，就是基于陶器生命史对符号产生、使用和废弃的相关性进行反思。

本文虽未针对刻画符号所表现的内容展开具体探讨，但从既往学者的研究可以知晓，双墩文化刻画符号包含了大量物象和抽象知识，双墩文化先民用符号记录这些知识信息，并传播了一定的地域范围。这些早期定居聚落中的知识信息可以通过环境考古、聚落考古、动物考古和植物考古等研究窥见一斑，利用自然科学知识手段开展的考古学研究有助于复原双墩文化时期早期定居聚落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

-
- [1] a.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安徽省蚌埠市博物馆. 安徽蚌埠双墩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 考古学报, 2007, (1).
b.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蚌埠市博物馆. 蚌埠双墩: 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8.
 - [2] a. 阚绪杭. 定远县侯家寨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 // 文物研究: 第五辑. 合肥: 黄山书社, 1989: 157~170.
b.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定远侯家寨: 上册.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22: 93~128.
 - [3] 南京博物院. 江苏句容丁沙地遗址试掘钻探简报. 东南文化, 1990, (Z1).
 - [4] 同[1] b.
 - [5] a. 张东. 安徽蚌埠双墩遗址2014~2015年发掘收获 // 中国重要考古发现: 2016. 北京: 文物出版

- 社, 2017: 20~25.
- b. 张东. 安徽蚌埠双墩新石器遗址聚落考古获得新收获: 遗址核心区的聚落结构更加清晰. 中国文物报, 2019-1-25 (08).
- [6] 徐大立. 蚌埠双墩新石器遗址陶器刻划初论 // 文物研究: 第五辑. 前揭书: 246~259.
- [7] 同 [1] b.
- [8] 黄德宽. 蚌埠双墩遗址几何类刻画符号试释. 东南文化, 2012, (3).
- [9] 吕春瑾, 王吉怀. 基于双墩刻画符号的中国文字起源内在机制研究. 华夏考古, 2018, (1).
- [10] 拱玉书, 颜海英, 葛英会. 苏美尔、埃及及中国古文字比较研究.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9: 122~129.
- [11] a. 徐大立. 试析双墩遗址植物类刻划符号. 东南文化, 2006, (6).
b. 徐大立. 蚌埠双墩遗址“匚”形刻划符号释义. 东南文化, 2007, (6).
- [12] 同 [8].
- [13] 黄亚平, 孙莹莹. 双墩符号的构成方式以及对文字形成的影响. 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 (1).
- [14] 蔡运章. 蚌埠双墩“刻画符号”略论 // 蚌埠涂山与华夏文明. 合肥: 黄山出版社, 2002: 309~318.
- [15] 冯时. 上古宇宙观的考古学研究: 安徽蚌埠双墩春秋钟离君墓解读. 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2011, 82 (3).
- [16] 李新伟. 中国史前陶器图像反映的“天极”观念. 中原文物, 2020, (3).
- [17] 何驽. 怎探古人何所思: 精神文化考古理论与实践探索.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5: 372~375.
- [18] 黄德宽. “蚌埠双墩遗址刻画符号暨早期文明起源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综述. 中国文字学报, 2010, (1).
- [19] 王蕴智. 双墩符号的文化特征及其性质. 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 (5).
- [20] 何靖. 中国文字起源研究. 成都: 巴蜀书社, 2011: 1~66.
- [21] 丹尼丝·施曼特-贝瑟拉, 著. 文字起源. 王乐洋,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5: 1~21.
- [22] 拱玉书. 陶器刻画符号在文字起源中的作用: 以西亚地区为例 // 古代文明: 第5卷.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6: 85~124.
- [23] 来国龙. 文字起源研究中的“语言学眼光”和汉字起源的考古学研究 // 考古学研究: 六.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6: 53~78.
- [24] 严文明. 半坡类型陶器刻划符号的分类和解释. 文物天地, 1993, (6).
- [25] a. 袁广阔, 马保春, 宋国定. 河南早期刻画符号研究.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2.
b. 张炳火, 主编. 良渚文化刻画符号.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5.
- [26] 需要指出的是, 这里所指的context不同于目前田野考古学常用的小堆积单位。英国考古学家马克斯·福斯特 (Max Foster) 早将“Context (关系单位或堆积单位)”应用于约克和伦敦的城市考古发掘中, 作为考古发掘现场可区分和记录的最基本单位。爱德华·哈里斯 (Edward Harris) 设计了“Harris Matrix (哈里斯矩阵或哈里斯丝络图)”以表现堆积单位间的时序关系。
- [27] 刘岩. 西方考古学的关键概念: Context的含义分析. 东南文化, 2020, (1).
- [28] 王小娟. 晋南地区新石器时代末期陶器工业. 北京: 北京大学, 2014: 30.
- [29] 李文杰, 黄素英. 大溪文化的制陶工艺 // 中国原始文化论集: 纪念尹达八十诞辰.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9: 400~427.
- [30] 朱铁权. 双墩遗址陶器掺和物的植硅体和拉曼光谱分析 // 蚌埠双墩: 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 前揭书: 642~645.
- [31] 宁夏海原林子梁新石器时代遗址T9③AF9发现的晾坯遗迹, 参: 李文杰. 中国古代制陶工程技术史. 太原: 山西教育出版社, 2017: 155, 156.
- [32] a. 付永旭. 广西宾阳县新窑村的现代制陶技术. 中原文物, 2011, (6).
b. 赵美, 李培聪. 怒族手工制陶的考古学调查 // 峡谷中的怒族社会. 昆明: 云南大学出版社, 2012: 403~413.
c. 张宗显. 西藏巴热村制陶工艺调查 // 亚细亚民俗研究: 东亚民俗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第1集. 北京: 民族出版社, 1997: 104~114.
- [33] a. 同 [1].
b. 同 [5].

(责任编辑: 贾正言)